

書評論壇
評論以「跨雜糅性」(trans-hybridity) 作為
「批判性方法論」基礎的未盡之路

丁仁傑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Paul Katz是一個令人敬畏的歷史學者，深入歷史現場的意志與貫穿力，向來是他的作品所給人的最鮮明的印象，批判他人對歷史現場詮釋上的方法論的不足，則始終是他最深的內在興趣。因此，要給Paul Katz寫書評也是一件令人畏懼的事，在歷史學家精湛技藝之筆的對比下，自己恐怕稍有不慎就會成為不懂歷史現場與文化理論現況的烏龍判官。不過，不同學科之間，確實是應該相互觀摩與學習，基於這個基礎，一方面我欽佩於Paul Katz的歷史分析上的成就，一方面也嘗試從社會學的觀察角度，對他這本2021年甫出版的新書*Religion, Ethnicity, and Gender in Western Hunan during Modern Era: The Dao among the Miao?* 提出我個人對該書的一些感想。

該書的寫作，起初出於中央研究院2010到2014年的湘西重訪計畫。這個計畫早先的基礎來自於中研院早期的前輩民族學家凌純聲與芮逸夫1933年歷經3個多月考察而成的湘西苗族實地調查成果，該成果1947年正式出版《湘西苗族調查報告》，厚達近五百頁。《湘西苗族調查報告》背後的潛在預設是苗漢同源論，敘事充滿了文化獵奇的色彩。《湘西苗族調查報告》出版時就聲名大噪，成為中國國內學者所出現的相當早期而具有典範性的民族調查報告。凌、芮二人不通苗語，當時這個調查的苗族助手是石啟貴，石啟貴後來也出版了一系列苗族的考察報告（詳見石啟貴 1986），石啟貴的報告更多涉及苗族的政治、司法、教育與衛生環境，背後主要的訴求來自於政治自覺的追尋與發揚民族特色的熱情。這兩組報告的差異，也形成了一段公案，也就是同樣的田野，卻產生了兩種調性完全不同的文本（參考張秋東 2010）。

八十多年過去了，當年的素樸調查之後，當代的苗族研究顯然已不僅是少數民族習俗與文化的調查，而可能被結合在更廣泛的華人地方社會與宗教

關聯性的理論與經驗性的討論框架裡來做對照。於是，建築在前述兩種對照性的文本之上，以及以各種當代文化理論為對話對象，Katz得以重新站一個新的理論高度來檢視湘西苗族的宗教神話、儀式、慶典、宗教場所與宗教專家，並且在書中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論觀點。

作者自己說：「本書旨在透過歷史學與民族誌的角度，考察近代湘西苗族地區漢人與非漢族群儀式傳統之間的交涉。本書從接觸帶（contact zone）的概念出發，重探道教與當地儀式傳統共同參與以及塑造地方宗教文化的方式。這些現象不只包含道教神祇、經典、科儀的傳佈，也牽涉到地方信仰與實踐的存續和演變，個人認為可用『跨雜糅性』（trans-hybridity）來加以理解。」作者指出，而透過湘西的案例，有助於檢視過去研究地方社會的學者所提出的觀點，如James Watson的「標準化」（standardization），Joseph McDermott的「鄉村四重奏」（village quartet），John Lagerwey的「以廟宇為中心之社會」（temple-centric society）等。

如我一開場所講，Katz學術上的優點，是他展現歷史現場的能力與方法論上採取批評立場所具有的力道，尤其透過他驚人的史料蒐集與文獻鋪陳的能力，能跨越中英文及古今，甚至是能跨越經驗材料與理論討論間的鴻溝。全書的文獻以及相關觀點的呈現，幾乎已經達到了絕無遺漏的地步。目前全書鋪陳的方式，除導論與結論外共有七章，前三章是有關湘西地理環境、開發史與族群分布概況；廟宇分布；儀式專家等的描述性說明。後四章則集中在幾個與儀式有關的主題上：神判儀式、1942年跳仙民變背後的女性神媒的角色、跳香儀式的介紹與它與苗族盤瓠（犬神）信仰間的歷史連結、以及苗族的酬神儀式還籙願的介紹與分析等。

正如Katz過去的專著裡所常做的：出售一個主要的核心概念。像是他在2009那一本令人印象深刻的專著*Divine Justice*裡，所賣的概念是「回響」（reverberation）：「宗教與法律間的相互共振與往返」，「因為理想很少在人間的法庭達成，許多一般百姓把信仰放在諸如城隍和東嶽大帝這樣的司法神，和與這些陰間司法科層有關的神聖地點，其目的在激發出認為神明的正義確實是存在的相關感受」。「回響」這個詞在本書裡又再一次出現了，不過指涉的意涵被擴大了，本書中主要是指道教與各種地方傳統間的相互往

返。這個「回響」的想像，進一步構成了本書所要賣的核心概念：「跨雜糅性」（trans-hybridity）。具體來講，這是指地方與外來文化間的相互交涉所形成的性質，它絕不是單方向的，而是兩種過程間的共振和交混，這兩種過程是：A外來者的菁英主義或文字式的傳輸，目的在將少數民族予以文明化或標準化，書中稱此為「轉譯」（translation）；和B地方民眾用自己的傳統與方法來使用文化霸權裡的內涵，甚至藉此來增強自己內團體中的認同，書中稱此為「雜糅性」（hybridity），它往往也是出於非預期性而產生的一種效應。而「跨雜糅性」就是指A與B之間的一種「回響」。

本書第一頁開宗明義，就列出了本書所要探討的四大問題：

1. 非漢族社會的儀式傳統和來自漢人的制度性宗教，如道教，二者間的互動方始，曾歷經了什麼樣的歷史變遷？
2. 性別和族裔的因素在其中如何型塑了這個互動的過程？
3. 本書中所提供的湘西案例，與其他中國地區如：中國西南的情況之間，有何共通性與差異性？
4. 就中國現代史的研究課題來講，以上這些現象，尤其是由非漢民族發展的角度來看，又帶給了我們什麼樣的啟示？

在全書材料鋪陳之後，作者在結論一章，直接對以上四個問題提出了解答，最簡要來說，Katz認為：

1. 文化互動過程裡，「跨雜糅性」是其中主要的內涵，既有菁英的主導，也有地方社會自己的適應和選擇，要視各地不同的歷史過程而定，例如苗族盤瓠信仰型態與還籩願祭典的內涵，都仍是充滿了本土色彩。
2. 從結果上來看，苗族中的女性始終是儀式過程裡重要的儀式專家，宗教復興過程中，女性也扮演了更具有決定性的力量，這在中國西南許多少數民族中都是如此。
3. 湘西地區的例子和過去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與東南移墾社會研究的許多例子相

仿，決定這些邊境地區文化型態的因素，和國家有沒有財政和軍事能力來進行遙遠距離之外的滲透與管控有關，而這些地區也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與融合（assimilation）的過程，地方社會中在地菁英能創造出自己的實踐策略，其中年長女性的角色往往是極具關鍵性的。

4. 各種例子顯示，地方並未標準化，文化實踐往往還是透過口述傳統而得以保存，這是地方生存的軌跡與智慧，是地方文明所彌足珍過之處，更是全球生態裡的珍寶。

以族裔和女性（性別差異也是因族裔差異而產生）在宗教活動中的實踐來做為批判形成的槓桿，批判的對象主要對焦於Lagerwey的廟宇中心論、儀式專家的階層論（苗族的宗教階層可以和漢族完全顛倒）、Watson的標準化理論，和華南學派帝國框架的想像，在這些方面，Katz所作無疑是成功的。因為族裔和女性，確實是前述框架裡的一個遺漏。可是我也要問，苗族本來就非漢族，這樣一個異質化的地方社會，本來就不是前述理論框架所要應用的範圍。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這樣完全異質性的社會，而且又處在地理上極為邊陲的位置，其實當苗族有一點點的嵌入漢人宗教的儀式內涵或節奏，尤其是當道教已成為苗族儀式組成裡重要的一部分時，它已經就是值得大書特書而具有社會學意義上的事實了，這難道不是已在某個程度上證明了帝國框架和道教框架確實在邊境社會曾有過某種影響？換言之，選擇苗族作為批判華南學派和標準化理論的支點，作者藉此所提出的多采多姿的批判確實精彩，但是強度上可能要打一個折扣。

還有，作者對開宗明義四個大問題所給出的答案，讓人不盡滿意，它們基本上還是圍繞在本書的核心概念「跨雜糅性」上，而沒有給出進一步的分析。必須說，「跨雜糅性」這個概念，的確可以形成「批判性方法論」上的基礎，但它本身並沒有實質性的分析內涵。這也可以看出Katz的寫作風格，不是他不去做或是沒有能力去做進一步的分析，而是說在前兩個學術旨趣之下（還原歷史現場和批判他人對歷史現場詮釋上的方法論上的不足），讓他猶豫不前，對提出整體性分析這件事一開始就採取了保留或甚至是敵視的態度。

而對身為社會學家的我來說，在「跨雜糅性」概念之外，還想看到更多對於帝國國家治理框架更多整體性的分析，苗族集社權力與權威操作的道德想像，以及苗族內建性的對於外文化吸納的機制等等方面的討論。譬如說，本書一開始所描述的當地故事，當太上老君假扮乞丐來人間，請人揹他渡河，不同人對他恭敬的態度不同來決定最終結果。拒絕幫忙的道士爾後的宗教品位最低，還必須站著念經文來執行儀式；其次是「巴代扎」，他也要站著做儀式，用漢語做儀式，但不需要用文字經典；最貧窮、最勤奮但態度最虔敬的仙師（靈媒），後來只要坐著做儀式就可以，而且是可使用苗語。這個故事被作者用來證明地方社會雖然引進了道教，但和漢人社會「道、法、巫」這樣的階層順位完全相反，而是「巫、巴代扎、道」，使用文字最多的道士反而地位最低。作者引述這個故事，確實是能說明其「跨雜糅性」概念的極佳範例，不過，對社會學家來說，這個故事可能還沒完，而將會更關心於這個故事的起源？傳播者？如何與階級意識的形成有關？而當地階級或階級意識是否分明？階級之間是否具有排他性？與漢族的階級觀念有何差別？階級與社會流動之間的關係又如何？換言之，也就是在一個「後設的」具有比較性或綜合性的層次（關心複雜現象背後運作的整體邏輯），受到漢族治理與漢文化影響的苗區，其社會階級的運作，會和漢地之間有何根本性的差異？進而創造了新型態的（或僅是舊瓶裝新酒）宗教階層？這對於階級理論則又提供了一種什麼樣的新的理解？

當然，這樣的分析，必然又會落入於歷史學家對於過於宏觀而具有綜合性理論企圖分析的批判。總之，歷史學家「跨」（trans-）這樣的方法論上的立足點，與社會學家「後設分析」（meta-）這樣的整體性分析的知識旨趣之間，似乎是具有了一種難以跨越的不相容性，這是在閱讀本書後，感受到深深的失落感。

參考書目

石啟貴

1986 湘西苗族實地調查報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凌純聲、芮逸夫

[1947]1990 湘西苗族調查報告。上海：上海書店。

張秋東

2010 「文化獵奇」與「政治自覺」：凌純聲等與石啟貴的湘西苗族研究比較分析。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5(3)：108-112。

Katz, Paul R.

2009 Divine Justice: Relig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egal Cultur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